

陈乃华：《华夏边缘》前后

陈乃华

什么是“中国人”？为何宣称我是“中国人”？这些提问似乎困扰着处于边缘的中国人，尤其在华夏边缘的台湾，更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王明珂先生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是一本具有历史人类学问题意识的“民族史边缘研究理论”著作，运用人类学与历史学汇流的方式，王先生探索过去的建构如何诠释现在的人群认同以及现在的人群认同中过去如何被建构，并试图以集体记忆与族群理论的方法，对历史实体论和近代建构论进行同时超越。

《华夏边缘》一书的简/繁体字版本，在空间上由台湾来到大陆，在时间上也相差了近十年寒暑。除了对族群认同与社会记忆、边缘研究的主要基调不变，这两个版本又有着些许不同的方法背景和对话主题，带着不同的旨趣和关怀。在第四部分“华夏边缘的延续与变迁”中，原繁体版本的“华夏边缘的维持：羌族历史记忆”与“华夏边缘的变迁：台湾的族群经验”，被代之以新的内容“近代华夏边缘再造”与“一个华夏边缘的延续与变迁”出现于大陆简体版中。简体版本在方法上更结合了后期基于羌族田野作品《羌在汉藏之间》的思考，也透露王先生对于人类学与历史学想法的延伸。以下呈现繁简版本的不同撰写，试图耙梳其思想背景。

繁体版的《华夏边缘》是在台湾族群政治现实关怀背景下的著作。在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框架下，当代台湾社会所形成的民主国家观念，蕴含着一种对“公民权力”的追求在其中；“族群认同”观念也由于“现代启蒙式的公民观念”的出现而蓬勃。台湾族群现象由于政治权力的时空更迭，而造成社会凝结，人群划分也有所变迁，即台湾族群经验的发展和民主社会政治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族群议题的负担是，族群性是当代思潮和论述中最容易受本质论(essentialism)拖累的观念之一，和亲属、性别相似，常被赋予某种“自然”(naturalness)的意涵，[1]族群认同也就成为加载在每个公民身上必须有的意识和判断。

正如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现代民族国家是一种现代的、以国族观为中心的公民-国家模式。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不同在于，传统国家的特性在于它的裂变性(segmentary)，且并无绝对的权力集装器，国家和社会关系较松散，国家只有边陲(frontiers)而无边界的概念(borders)；而现代社会以民族国家为特征，国家与社会高度融合，民族国家对于暴力的垄断及对于个人的监控统治较过去传统更具有支配的地位，[2]这种隐讳而深入的治理有赖于国家推动的公民观念(citizenship)及民族主义的传播。“民族主义不完全是意识形态，但它确实趋向与国家的行政一体化相连接。”[3]国家主权与公民权被民族主义包围在相连的圈系里，在任何公共、私人领域中，人被无所不在的国家权力所影响。泰勒在《承认政治》一文中指出，作为个体主义集合的民族主义，其背后的驱动力即是对“承认”的需要，而“认同”(identity)是由于他人的承认所构成。过去等级社会不依赖承认，人的存在是由社会地位相连接的社会生活来决定；启蒙运动后，个体主义的出现，也形成对于“本真”(authenticity)理想的追求：道德来自个人内在情感，情感开始有了个人独立的、具决定性的道德意义，而非如同过去那样隐没在上帝或善的宗教概念中。泰勒也提到，鲁索主张一种寓自由于平等(freedom-in-equality)的理念，来对抗过去等级制和依附他人作为特征的社会，并强调个人的认同。故认同在现代社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现代性中，作为荣誉基础的等级制度崩溃，与民族、个人观念联结的“尊严”概念凸显，这不同于以往阶序观念发达的社会中“认同”是一个根本没有必要主题化的概念，其表现是一种缺乏整体主义后，个体在虚无中要求被看待、被正视、被依赖的生存状态。[4]

在要求公民权的民族国家框架中，族群概念如何被社会所强调？族群身份认同的概念又如何作为一种思考策略？

王先生指出，族群是一种以文化亲亲性为根基，以集体记忆与结构性健忘为工具，凝聚和调整人群，以应付现实资源之争的人类社会结群现象。社会环境变迁导致人群利益关系的重组，这是造成族群认同变迁的因素，因而在移民社会或是在急剧政治经济变迁中的社会，正是观察认同变迁的最佳对象。[5]台湾多元族群社会中，有闽、客汉人与原住民各族的分类和族群界线(ethnic boundary)。自清代以来，陆续移民台湾的汉人占了人口的大宗，因祖籍来源不同而有漳、泉州与客家等区分，后又因省籍意识不同而有本省、外省之别，这些背景构成了台湾的族群体系(ethnic system)。由于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历史变迁与伴随的移民，造成资源分配与竞争关系的改变，也形成了各族群认同在不同时期的区辨与统合。

日据时期，台湾人的中国认同在殖民背景下使边缘特质不断被强化，在“去中国性”的皇民化政策中，士绅们有着特殊的国族危机，这些精英又透过言行、书写加深华夏认同，成为台湾社会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22辑

往期查询

- 费孝通百年纪念专题
- 新书推荐
- 郭净文集
- 王铭铭文集
- 陈永龄纪念文集
- 李安宅研究专题
- 萧梅文集
- 庄孔韶文集
- 胡鸿保文集
- 翁乃群文集
- 林耀华百年诞辰专题
- 《探讨》目录
- 列维斯特劳斯逝世纪念专题
- 人类学的社会理论
- 藏彝走廊专题
- 吴文藻专题
- 王东杰文集

学术链接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所

CCPN中国比较研究网

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网

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

中国社会学网

中国学术论坛

人类学在线

分。殖民时期后国民政府迁台,积极推动国民政府的“中国正统性”,加上相应的仇日教育,使台湾群众融入了中国认同与后殖民思想意识交战的窘境,本省籍人士与外省新移民关系也因竞争关系而益发紧张。1947年爆发的二二八事件引起本省、外省籍冲突,在之后长时段的戒严时期,被压抑的集体受难记忆也不断强化。到70年代的台湾社会民主化、本土化过程中,又带来了重大认同变迁:1979年激烈警民冲突的美丽岛事件和1986年解除戒严令后的两岸开放,造成了对于外省籍及大陆人民的“异己感”。统独之争也成了华夏边缘维持或变迁的因素,借历史记忆加强或淡化与中国的关联以面对当前政局。[6]在台湾去中国化的主体建构过程中,“中国性”的排除使台湾人的属性更形明显,而外省人士的中国属性反成了“他者”的差异特质所在。台湾人本省人透过对“中国性”的失忆而构建台湾的新认同,这样的失忆恰恰与外省人的中国认同记忆凝聚形成了对照。台湾面对的正是这种分裂的民族认同与隐晦的族群政治。族群认同常属于一个不断移动的概念,族群边界范围也随之调整。台湾的人群分类也随着范围变动,有着不同的意义指涉。台湾人、中国人是一个具时间历程变迁的概念,其中牵涉到群体间主观认同的定位、相关的政治权力关系竞逐及不同集体过去记忆的差异诠释和援引。在过去(the past)与现在(the present)记忆的交错空间里,族群认同透过属于不同政治格局、不同诠释观点而延续下去,区隔或凝聚的对象也随之发生变化,所使用的主观历史、文化特征也随之异动。

围绕中国与华人社会所发生的族群议题,须将三个形塑族群界线的因素考虑进去:其一是华夏文化或汉文化的认同;其二是异族统治的历史所激发的汉或中国的认同;其三是社会主义概念的民族(nationality)认同概念。可以再延伸的是,由形塑过程中了解什么是古代华夏、中国与近代中国政治体的边界与内涵,何为华夏主体与汉文化的内涵,汉非汉以及汉化的概念是什么,谁是汉化、国家化、现代化的推动者,族群接触过程中,各群体所面对的“中国性”分别是什么。[7]

面对什么是汉人、什么是台湾人、什么是中国人的概念不清,王崧兴先生提出“从周边看汉人的社会文化”,也是对台湾20世纪70年代的浊大计划所发展出“土著化”概念,而忽略“原住民”对移入汉人的影响而提出的质疑;并进一步强调由汉人周围,或汉人内部与汉民族接触与互动的异族观点入手,来看汉民族的社会与文化。[8]此研究包含了汉人的社会文化与周围异族接触的过程、异族的社会文化对汉人的影响,用异族所建构的汉人意象来了解汉人社会文化的特性[9]认识汉与非汉的社群(community)建构是如何可能,通过异己分类、自我与他者的互动状况,分析双方对过去历史的差异诠释如何用来反映现在关系,以呈现一个社群构建认同、概念化自身的形成与维持过程。王明珂先生同样也采取一种由边缘看中心的视角,来认识“什么是中国人”。在族群现象中,中国性(Chineseness)、汉、华夏等象征中心的语意词汇常常以随意地、极端暧昧变易的符号隐喻进行操作。不同的是,王先生尝试以历史观点来审视文本的任意性,并跳脱族群根基论和工具论缺乏的时间纵深度的局限,来论述台湾族群认同变迁的长时段背景。更重要的是,他试图透过对一个华夏边缘“羌”的论述,来阐述和对应另一个华夏边缘“台湾”的历史漂移过程。

在简体版《华夏边缘》中,王先生以中研院史语所的沿革和北川羌族的案例,结合人类学田野以进行历史与民族志分析,同时将视野带回华夏边缘的西南现场,着重描述汉化(sinisization)的宏观与微观过程中人们对“文化”与“历史”之认识,族群关系中所实践的习尚,及对“文化”的讨论、夸耀、污化与践行,来说明:“历史”并非只是过去的事实,更指的是人们所宣称、夸耀与回避的“历史记忆”。[10]他并谈及近代华夏边缘的再造、延续与变迁,更倾向一种动态的文化生产过程。当代台湾人类学的研究中最直接涉及汉人与异族关系和关于汉化的学术研究,近年来多见于对被视作“已汉化”的平埔族讨论中,并形成台湾的平埔研究。在“平埔认同复振运动”里,过去许多被认为已汉化的平埔族后裔重新发掘其传统文化,并在族属上重新正名。叶春荣在《平埔的人类学研究》一文中,指出研究的三种立场——1. 汉化即同化, 2. 汉化即涵化, 3. 不是汉化,是合成文化,[11]并强调族群、文化、历史是不能忽视的三个核心要素。“关于不同群体间文化接触与变迁的过程,人类学家常以“涵化”(acculturation)的概念解释,以了解由个人所组成的不同文化群体,如何因直接的连续性接触而导致双方原有“文化模式”的改变……研究者有意无意的汉人文化中心主义之作用,使得有关研究往往是用汉化(sinicization)之类的同化(assimilation)概念来引导,研究多半以汉化为其结语,……由此,潘英海提出“文化合成”的概念来取代汉化,以避免文化中心主义”。[12]

John Shepherd采取“汉化即涵化”的观点,认为汉文化在与其他文化接触过程中彼此融合与吸收,不过群体间的互动结构以及优势次序决定涵化的方向与速度;以汉化指称非汉人成为汉人的族群认同变迁(ethnic change),并着重探讨变迁过程。人们自称为汉人,且以祖源历史证明自身为汉或与汉同源,形成族群自称的汉化与历史记忆的汉化。[13]但王明珂先生指出,涵化(acculturation)与同化(assimilation)是有所区别的,涵化是采借他者的文化,而同化则指认同变迁。[14]他还将汉化定义为只牵涉文化变化的涵化,这只是回避问题,回避在中文语意里“汉化”的确包含“成为汉人”的族群认同变迁之意,也回避了“文化”与“族群认同”之关联的问题。“汉化”,实则是一个涉及个人与群体之文化表征、社会习性、历史记忆、主观认同与现实利益等等族群认同变迁的现象。在华夏边缘处,汉与非汉界线模糊,人们以一种动态的认同过程,宣称并争论“历史”,夸耀、展演“文化”与习俗,造成认同变迁。[15]

族群文化从静态到动态的推演,也经过两个时期的讨论:1960~1970年代以来,以客观文化特征来理解和界定文化受到批评,族群的实体论忽略了华夏边缘的历史变迁以及人们跨越汉与非汉的能力。1980~1990年代后,受到实践理论与表征研究的影响,重视族群认同中“历史”如何在人的实践中建构、争论与想象;“文化”作为一种表征体系,又是如何被人诠释、创造、操弄和展演。以“赐姓”等文明化仪式(civilization ritual)为例,可视为一种文本“表征”(representation),在“授与”和“受赐”中表达、强化的“本相”(reality)则是社会所界定的官与民、汉与非汉、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借由各种符号象征、物、声音、行为、情绪编织而成的叙述,呈现对汉文化的仰慕与攀附。[16]“本相”表现结构特质,“表征”呈现展演特质,并借此进行“表征分析”(representation analysis),由表征抽离出背后的本相意义。认同与文化变迁过程就是借着邻近人群间的模仿、攀附与相对的区别、夸耀的动态过程进行,即,可以将族群体系视为一种社会本相(social reality)或情境(context)并产生许多表征(representation)与文本(text),而这些表征与文本,又反过来强化此族群体系。

运用族群理论研究并结合人类学中对习性与实践理论的讨论,不再将个体视为外在结构、文化模型宰制的空壳,进一步探究个人意图、策略、政治、阶级、权力在行动中的运作,呈现个人和外在结构在实践

过程中的辩证交织。[17]

王先生以这种带有实践色彩的族群理论,试图解决国族论述中将族群内涵、历史实体化的局限,借由一种与认同相关的“历史”,人如何在实践中透过它来承载意义和新的脉络,并经由竞争与协商来产生新的意义,“历史”就在时间、记忆中不断延续,也将脉络下、动态的“历史”,与本质性、静态的历史相对应。这样将“历史”视为文本,在族群背景的脉络下变迁的讨论,一如语言人类学对社会文化现象研究的启发,即在肯定文本(text)与脉络(context)缺一不可外,并纠正将文本与脉络本质化(essentialization)或实质化(reification)的谬误,从而去揭示过程(processes)与表演(performance)的重要性;将焦点由静态的文本(text)转向动态的文本化(entextualization),由静态的脉络(context)转向动态的脉络化过程(contextualization)。[18]

华夏边缘地带形成了一块模糊、汉与非汉的跨界,这条界线在人的认同中延续与变迁,也造成了华夏边缘的移动。以北川羌族为例,在过去,为了跳脱低劣的社会地位,透过模仿汉人习俗、攀附汉人祖缘记忆而成华夏,也透过“一截骂一截”的压迫与歧视,发泄来自邻近人群的竞争压力,使华夏边缘西移;当代,也为了追求较好的社会存在,人们逆反过去的的汉化过程,转而“一截攀一截”地成为羌族,华夏边缘又向东移;[19]经由呈现一种动态的、历史延续的过程,来重新思考“汉化”这个概念。

对于“国族历史”的论述,台湾学界中关于近代中国国族建构的研究有两篇重要的文章,分别是沈松桥先生的《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知识分子的国族建构》[20]与王明珂先生的《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21]这两篇论文对近代中国国族建构和相关的历史、文化建构过程的不同对话,也可映照出民族-国家中对历史的不同理解,延伸到对当下本相历史与表征“历史”的概念运用。

沈先生借由分析黄帝神话在晚清知识界的流传与断裂,呈现出19世纪西方民族国家兴起,国族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一个近代发生的产物时,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借由国族论述来企图创造一个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中国。探索近代中国国族的建构与冲突,由选择、想象黄帝作为中国人的祖先,并由“皇统”到“国统”、炎黄子孙到国族的认同变迁。此文强调的是“历史”的断裂与想象,制造想象的行动者又是如何运用过去作为国族起源的“历史基础”。[22]

王先生则提醒,如果不以“近代”来断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有一种族群想象是历经2000年长时期才形成当代的炎黄子孙,这是由于一种普遍的心理与社会过程“攀附”所造成,并在血缘记忆和想象上使华夏边缘扩张。这是一个历史连续且漫长的过程,有其古代基础而非仅基于近代历史的想象。古代并非如近代建构论者认为的同质、停滞的状态,所谓近代建构也只是长远历史建构与想象的一部份;而近代中华民族的形成,也基于一长时段的族群形成过程(ethnic process),在此,强调一种历史的延续性。这种历史,非国族主义下的历史,而是华夏边缘角度下的历史。[23]

两位先生皆基于对近代中国国族建构的历史探寻,并阐释Appadurai把过去视为有限而具有弹性的象征资源,人群透过对话借以调整“过去的内部辩论”(the inherent debat-ability of the past),以供众人在政治场域对其意义进行竞争的过程。[24]也如康纳顿(P. Connerton)去询问起源兴起有关的社会记忆模式,究竟是一种断裂还是延续?这种新的起源的记忆事实上是企图建立一个全新的时代氛围以对旧的时代进行全面的取代,但社群的历史建构又为何总是试图消抹这种断裂性?[25]或许沈先生的缺失是以近代民族-国家论述割裂了历史延续性,将近代之前的历史简化为一个同质的状态,而王先生代以“攀附”的文化动态过程,呈现了延续的历史样貌。但王先生同样也触及到把历史分离的危险,以动态和静态的过程将“文化”、“历史”与相对应的文化、历史二分,将历史视为理性的、可欲的,一种否认其他历史的记忆选择。虽然人类学关心的历史往往需和今天产生关系,现代文化也成了几个世纪的“被发明的传统”,[26]但民族国家由于对“认同”概念的强调,将历史化为共同体的根基想象,也间接造成研究者在面对文化再现或建构过去时,又急于想指出民族国家的历史其实是伪装在面具之下,以致将“发明”(invention)、“创造”(creation)等同于“虚假”(false),在认同衍伸的“表征”(representation)之下似乎还存在一层“真实”(reality),也无形中为历史加上了引号,成为二分的历史与“历史”。国族认同上的操作,将社会表征和社会本相二分,可能造成对历史和文化的消解,这是族群认同论述学理上的局限。虽然人不能逃离主观的、可欲的“历史”,但更需要有以社会、文化结构为基础的历史,如此才不致陷入国族认同的强迫性目的论,又能从历史中提出过去对于现在产生意义的方式,实践“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27]

借由阅读王先生《华夏边缘》前后书写,呈现了边缘研究对于西南中国及台湾地区这两个边缘彼此间的相互隐喻、补充,并借此周边的描述展开中华民族起源形成过程的讨论,勾画出古代中国的族群面貌。以民族的历史文献及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式去结合过去与当下,指出边缘看中心的独特视野,也将台湾学术的思考传统引出。

如何从边缘看中心,从周围看华夏的社会文化,汉化的认同变迁过程和族群理论思考,都在此书有了论述。在台湾多元族群政治的发生背景下,学者有其试图回答的现实关怀,而透过认识此书的学术脉络,可获得更好的理解:在历史中的华夏族群认同是如何弹性地跨越边界,进行竞争或共享资源?该如何认识在近代之前华夏多元族群共处机制的历史基础或延续性?具有时间纵深度的族群理论又如何在过去历史中展现?一个站在不同视野上,引人随想的华夏边缘思考。

[收稿日期]2008-03-07

[作者简介]陈乃华(1979~),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5级人类学博士候选人。北

[收稿日期]2008-03-07

出自:Northwest Ethno-national Studies 西北民族研究 2008年02期

[1]何翠萍,蒋斌.国家、市场与脉络化的族群[C].2003.2~3.

[2]3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北京:三联书店,1998.2~256.

[4]泰勒.承认政治[A].陈清侨.身份认同与公共文化——文化研究论文集[C].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3~39.

[5]王明珂.过去、集体记忆与族群认同:台湾的族群经验[A].中研院近代所.认同与国家:近代中西历史的

- 比较[C].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4. 253.
- [6]王明珂.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 台北:台湾允晨丛刊, 2001. 382~388.
- [7]何翠萍, 蒋斌. 国家、市场与脉络化的族群[C]. 2003. 10~25.
- [8] 9黄应贵. 导论[A]. 黄应贵、叶春荣. 从周边看汉人的社会与文化:王崧兴先生纪念论文集[C]. 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1997. 5~11.
- [10] 、14 王明珂. 华夏边缘[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230~239.
- [11] 叶春荣. 平埔族的人类学研究[A]. 徐光正、黄应贵. 人类学在台湾的发展:回顾与展望篇[C]. 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1999. 107.
- [12]黄应贵. 导论[A]. 黄应贵、叶春荣. 从周边看汉人的社会与文化:王崧兴先生纪念论文集[C]. 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1997. 16~17.
- [13] Shepherd, John R. Rethinking Sinicization : Processes of Acculturation and Assimilation. 2003. 133~150.
- [15] 、16 、19 王明珂. 华夏边缘[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230~245.
- [17] Borudieu , Pierre.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18]何翠萍, 蒋斌. 国家、市场与脉络化的族群[C]. 2003. 2.
- [20]、22沈松侨. 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知识分子的国族建构[J].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 1997. 1~17.
- [21]王明珂. 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J].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002.
- [23]王明珂. 华夏边缘[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583~623.
- [24] Appadurai, A. The Past as a Scarce Resource. Man (N. S.) 1980. 202.
- [25]康纳顿. 社会如何记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9~23.
- [26]霍布斯邦. 被发明的传统[M]. 台北:台湾猫头鹰出版社, 2002.
- [27]杜赞奇.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16. 问题, 并斗胆将它们提了出来, 以期得到更广泛的讨论。

[中心简介](#) | [评论简介](#) | [探讨简介](#) | [探讨目录](#) | [编辑委员会](#) | [稿约](#) | [版权声明](#)

版权所有: Cranth.cn 《中国人类学评论》杂志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

Email: cranth@gmail.com

电话: 010 68936031

技术支持: [北京网站建设](#)——三幕天